

1920年行政改革與地名演變——以臺北為例

文·圖片提供／黃雯娟（國立東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副院長）

1920年，臺灣總督府著手進行臺灣統治以來最重要的行政區域劃分及地方制度改革，實施「州廳—郡市—街庄」三級制，全島被劃分為五州二廳，下轄三市、四十七郡、二百六十三街庄。其中尤以基層組織街庄影響最鉅，不僅確立現在臺灣鄉鎮市的基礎和起源，也是臺灣歷史上一次顯著的地名大變動。

1920年的行政改革

受到日本大正時期的民主潮流影響，原敬內閣成立後，任命了臺灣第一位文官總督田健治郎，1919年10月29日，田健治郎就任臺灣第八任總督。履任之初，一方面為縮短臺灣和日本本土行政組織的距離，一方面為了提高地方官員的地位和職稱，以作為臺灣實施地方自治的基礎。

1920年7月26日公布「臺灣總督府地方官官制」，改革地方行政制度，廢廳設州，將「十二廳」改為「五州二廳」，將臺灣西部分成臺北、新竹、臺中、臺南、高雄五個州級行政區；廢支廳，州下設郡，同時將原有臺灣的街庄制小幅度修改為市制，以提高都會的自治權限；廢區堡里鄉澳，郡下設街庄，原本在區管轄下的街庄和土名則改為大字和字（小字）。東部仍置臺東與花蓮港二廳，廳下設支廳，支廳之下設區

（花蓮港與臺東兩廳一直要到1937年底，其下級的行政區劃才改為與西部一樣的郡與街庄，1940年底才有東部唯一的州轄市——花蓮港市）。全臺分為五州、二廳、四十七郡、三市、五支廳，二百六十三街庄（規模約等同於今日的鄉鎮市），為「州—郡市—街庄」的三級制行政區域。至此，原來組成下級行政區域的堡和街庄，則廢除堡作為組織新街庄的空間單位，並以新街庄作為各種行業調查和統計的空間單位。

這次的行政區域變革可說是日治時代最後一次大規模的行政區域調整。至此以後，除了1926年增設澎湖廳，更改為「五州三廳」外，未再變動。1920年這次的行政區域調整，共維持了二十五年，一直到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為止。

臺北州行政區劃演變

以臺北州為例，下轄臺北市及七星、文山、海山、新莊、淡水、基隆、



▲ 1938年臺北州管內圖

宜蘭、羅東、蘇澳等九個郡，郡之下共有四十街庄。1924年，基隆郡的基隆街升格為基隆市；1940年，宜蘭郡的宜蘭街升格為宜蘭市。因此後期的臺北州擁有三個州轄市（臺北市、基隆市、宜蘭市）及上述九個郡。

1920年10月1日臺北市成立，管轄範圍包括原臺北廳直轄全部四區二十四個街庄，以及士林支廳所轄之士林区一個街庄，並改制為大字，即臺北城內、崁頂、龍匣口、古亭村、林口、三板橋（以上位於今中正區）、艋舺、下崁、加蚋子（以上位於今萬華區）、大稻埕、大龍峒、番子溝（以上位於今大同區）、山子腳、牛埔、西新庄子、中庄子、下埤頭、朱厝崙、上埤頭、大直（以上位於今中山區）、中崙（位於今松山區）、大安、頂內埔、下內埔、六張犁（以上位於今大安區）等二十五個大字。舊制街庄之下的土名改為小字，行政體制雖改，但當時的街庄名稱依然沿用清代舊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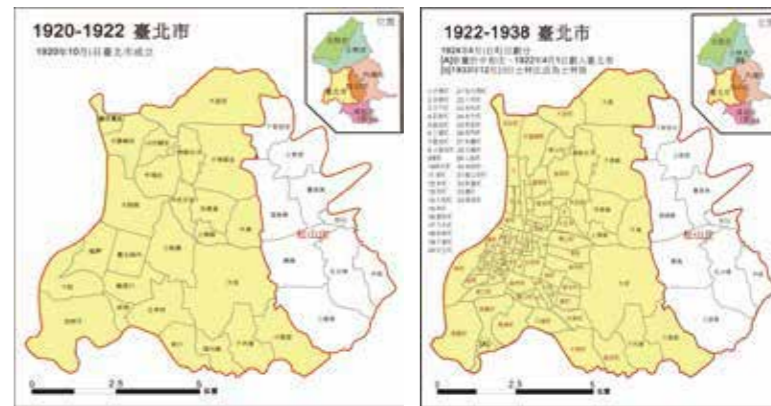
到了1922年開始著手實施「町名改正」計畫時，事實上就是根據街區的整編，重新劃定行政空間，並將新行政區以日式的「町」（ちょう）命名。「町」是日本行政區劃名稱，一般指城市內的行政分區。在此一制度下，臺北市將街區原來十五個大字區域，改劃分為六十四町。經過町名改

正之後，原有的街路系統也逐漸改為町名丁目的概念。

行政地名的變動

1920年的行政區域變革還有一項重大改變，即配合新行政區域的劃分將一些舊地名更新，這是臺灣歷史上一次顯著的地名大變動。以臺北州為例，當時地名變更的原則：一是採取簡化，將三個字的地名改為兩個字，例如坪林尾改為「坪林」，金包里改為「金山」；一是採用與舊地名日語發音相近的字替代，例如艋舺（Bangka）改為「萬華（banka）」、三角湧（Sankakuyu）改為「三峽（Sankyo）」取代，也有因舊有地名難以發音或不雅而直接更名，例如錫口（Malysyakkaw）改為「松山（Matsuyama）」等，或者依地名的字意改造為日式地名，例如枋橋更名為「板橋（Itabashi）」，水返腳更名為「汐止（Shiodome）」等。

此外，1916年基於同化政策，開始著手實施「町名改正」計畫，此時臺灣三個主要的都市——臺北、臺中、臺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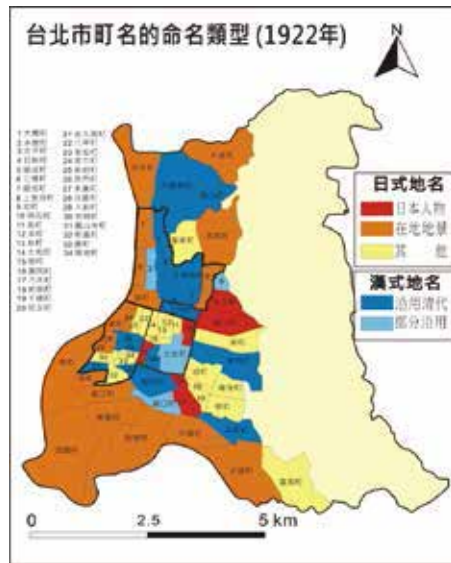


▲左圖為1920-1922年臺北市大字區圖；右圖為1922-1938年臺北市町區。（圖片提供／葉高華）

三地便同步展開町目的規劃。1919年臺南市首先改正町名。「町名改正」並非只是將舊的街莊名稱改為町名，而是臺灣總督府在市街的現代化之後，將大都市的市區部分重新劃定行政區，並將新行政區以日式的「町」命名，與郊區的「大字」同為戶籍與地籍上的單位名稱。

臺北市於1922年開始著手實施「町名改正」計畫，在此一制度下，將西半部十五個大字區域重新劃分成六十四個町；東半部十個大字維持原建制不變。在町名的命名上，根據1916年8月2日《臺灣日日新報》記載，清楚標示〈臺北街名改內地風〉，顯然當時的規劃方向是將町名內地化，直到1922年1月19日，田健治郎總督在市區計畫委員會會議上要求臺北的町名務必須尊重歷史。至此，臺北市的町名規劃急轉直下，由全然內地化轉向本土化，然而保留下來的漢式地名事實上僅有十五個。

從保留前清所留下的街庄名可以發現，除了文武町、書院町、龍山寺町、西門町保留清代既有的設施類街名，大龍峒町、古亭町、龍口町承襲舊有街庄名外，大部分保留的漢式町名仍偏向吉祥祈願式等較不具地域特性的地名。由此可見，雖然總督明文揭示了町名尊重



▲ 1922年臺北市町的命名原則。

歷史的理念，但在實際操作上，漢式町名其實數量有限，且從地理位置來看，仍主要集中於臺灣人居多的大稻埕及艋舺地區。至於日本人居多的臺北城內與周遭社區，甚至三市街之外的其他街庄區，則大部分改為日本式町名。至於日式地名的命名原則大致可歸納為：紀念式

（日本重要人物或時代，如兒玉、大正、大和等）及日本國內町名（如川端、崛江）。此一命名原則突顯町名的紀念化與重現化的命名特色；另外，以總督命名的町名也是臺北市町名的特色，顯然臺北市在町名命名上，同時兼具保留傳統與日本威權強化的色彩。

結語

結語

1920年是臺灣史上重要的一年，在空間治理上，清代所遺留下來的堡，作為一種社會空間領域，至此逐漸進入歷史；而由堡統轄的街庄和土名，轉化為大小字後，在新街庄的統轄下，亦進入另一階段的社會空間再結構；此外，尤其在城市區，透過街區整編與重新命名，形塑一個具有日本風格的町名系統。顯示出町名改正的基本策略，乃在於藉由空間的地域化、町名的日本化，預期透過日常生活的接觸、意識形態的灌輸，達到同化的目的。☞